

图书馆学理论视野中的图书馆事业

李超平

摘 要 在新中国图书馆事业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图书馆学报》作为一个理论平台,给予人们一个打量与论说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阵地。本文选择几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几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与变革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它们分别是:1957 年一种评述图书馆事业的话语方式的确立、始于 1959 年的乡村图书馆建设、始于 1975 年的乡镇图书馆“以文养文”、始于 1982 年的图书馆立法研究、始于 2006 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探索。通过上述回望,我们能观察到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在相互依存中的共同发展。参考文献 37。

关键词 图书馆事业 乡村图书馆 有偿服务 图书馆法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分类号 G259.2

Librarianship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LI Chaoping

ABSTRACT

As a platform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he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provided us the chance of observing, researching and commentating the history, status quo and future of librarianship over the past 60 years'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veral special years were chosen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refo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Unable to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as it is, this paper can at least draw a general timeline of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1) Due to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 a new discourse style used to commentating librarianship was formed in 1957. In the new discourse style, compliments were taken as the theme and problems were ignored, which definitely did not conform to academic standards. The discourse style was ended after 40 years and replaced by strategic research of the librarianship. 2) Originated in 1959, rural library construction was constrain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elf-solved mechanism of books purchasing funds came into being. The lack of continuous government funds resulted in its n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The phenomenon of "paid services" arose. Because of lack of funds, libraries had to adopt the mechanism of paid services, which had been a widespread service mode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for quite a long time. After entry into the new century, our economic strength has increased greatly.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made great efforts to intensify research and appeal of public service philosophies which finally prompted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library funds supply. 4) Originated from 1982, library law

通信作者:李超平,Email:mingzhiguwen@163.com,ORCID:0000-0003-2839-8068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Chaoping,Email:mingzhiguwen@163.com,ORCID:0000-0003-2839-8068)

research star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library laws. Rooted in Chinese library practice, the research produced some result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brary law making. Meanwhile,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made studies on other library legislative work and contributed to the making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library operations. 5) Begun in 2006, the exploration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was directed to the long-standing unsolved problem-lack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low service capabilities in grass-root public libraries. By construct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the problem was solved effectively through enhancement of funds and service capabilities. By the above retrospect, we can find the rel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library theo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 was not positive in the beginning but gradually matured. 37 refs.

KEY WORDS

Librarianship. Rural libraries. Paid services. Library law.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0 题解:何谓“图书馆事业”?

人们一般把行业的构成和整体业态称之为“事业”,图书馆事业就是一个国家各类型图书馆的构成、整体规模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等的统称。对于“图书馆事业”而言,它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的某种期许,以及为了实现这种期许而形成的共识。在社会管理的话语里,事业就是有目标、有投入、有规模、有效益的实际存在。

与“图书馆事业”常常混用的词汇是“图书馆实践”,所以需要先行作个甄别。首先,图书馆实践所指图书馆这一机构,即人们对图书馆作为机构的性质、类别、职能等等的认知与规定;其次,图书馆实践所指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包括文献的采编与借阅服务、信息咨询、阅读推广以及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技术支撑等等;第三,图书馆实践所指图书馆的运行机制与整体发展状况,包括历史沿革与现状、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法制建设、未来愿景等等。本文所讨论的图书馆事业主要指上述图书馆实践中的第三部分。图书馆事业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实际存在,既有它自身的运行方式,同时也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故在图书馆学理论框架里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 1840—2000》以编年

史的方式回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百年历程。纵观百年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节奏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相一致,一旦国家从动荡转入稳定发展,图书馆事业也随之获得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1949 年新中国诞生后是一次机会;1976 年“文革”结束是一次机会;2000 年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步入正轨,图书馆事业获得了一次更好的发展机会。

《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以来的 60 年,正好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上述三次发展。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以“图书馆事业”为主题的研究经历了哪些变化?图书馆事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问题域,本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1 1957:一种评述图书馆事业话语方式的确立

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底,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处于战后恢复与发展时期。数据显示,经过六年多的发展,全国公共图书馆达到 375 个,文化馆附设图书室达到 2 332 个;工会系统有图书馆(室)17 486 个;农村图书室 182 960 个;中小学图书馆约 10 000 个;高校图书馆 225 个;科学院图书馆 67 个;此外还有大量的机关、团体所属的专业图书馆(室)和部队图书馆(室)^[1]。

与 1949 年建国以前相比,反映图书馆事业

的数据是令人振奋的,图书馆事业正在逐步发展也是事实。然而,一项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成就既不能也不应该掩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阶段性地审视与评价图书馆事业的真实状况,在发现问题及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原本是事业发展过程中再正常不过、也是最必要的程序。1957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以“担任科学进军第一线的任务,而人少、事多、房缺、书乱,图书馆事业存在危机”为题,报道了在北京召开的专家座谈会的消息。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几个大型图书馆的馆长、副馆长,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等。专家们针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批评。时隔不久,《图书馆学通讯》发表了《谁说“今不如昔”》《“危机”从何说起?》两篇文章,通过与解放前对比,从图书馆数量、藏书量、从业人员数量等几个方面,展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此后直到1964年《图书馆学通讯》停刊,以及复刊以后的八十年代,论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多以讴歌成就为主调,较少论及存在的问题。

(1) 195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十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小组执笔的《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以下简称《十年》)一文,论述了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取得的成就,从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开门办馆、勤俭办馆、共产主义协作、学习苏联六个方面解释了取得成就的原因。

(2) 在“政治挂帅”的话语环境里,专业话语努力寻找着表达的机会与空间。1964年是新中国的另一个时间节点。刘国钧牵头的《五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成就》(以下简称《五年》)一文,从图书馆的基础工作、读者服务、馆际协作、学术研究和队伍培养几个方面,回顾与总结了图书馆事业从1960年到1964年五年来取得的成就与发展。与《十年》一文相比,《五年》一文更加突显出深厚的专业功底,以更符合

专业逻辑的方式梳理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路径。从此文可以看出,1959年“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图书馆事业减缓了发展速度,在业务层面和服务层面进行了调整与规范^[3]。

(3) 文革结束八年后的1984年,正值建国三十五周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主要成就》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执笔。从1949年到1984年,三十五年的纵向比较,就事业总体规模来说,无论是公共图书馆系统,还是高校图书馆系统、专业图书馆系统,以及工会图书馆系统等等,无一例外都全面增长^[4]。文章对图书馆事业给出了“较快发展”的结论。相比以往同类型文章,政治意味更为弱化,专业性增强。对图书馆事业的整体状况、专业领域的主要成就、专业教育的现状、专业出版物现状以及图书馆学会的形成与发展都分别进行了梳理,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勾画了一幅整体版图。尽管从整体上肯定了三十五年来图书馆事业“较快的发展”,但众所周知,真正的“快速发展”发生在两个时间段,一是建国初期,二是“文革”结束以后,中间有不低于十年的停滞时期。

(4) 建国四十周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40年》一文首次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共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造阶段(1948—1953)、全面建设阶段(1954—1965)、动乱破坏阶段(1966—1975)和稳定发展阶段(1976—1989)。文章分别对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每一种类型图书馆的发展与规模进行了总结;对专业技术领域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5]。无论是从数据的翔实、资料的全面还是从结构的系统与规范等方面来看,这篇文章与以往的总结类文章相比,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成为此类文章的一个终结。即以建国为时间起点,在“五”与“十”的整数年份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与回顾的传统,到此就结束了。

从1980年代末开始,另一种从整体上研究图书馆事业的选题逐渐活跃起来,其具体内容包括图书馆事业结构研究、战略研究等。黄纯

元是当时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相继于1986年发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6]、1987年发表《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结构》^[7]。这类研究在国际学术之林原本就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学者启动这类研究,也算是一种学术上的回归。即把图书馆事业作为一个问题域,客观地针对问题或论述、或实证,唯有方法之不同,没有立场之别。

2 1959年:乡村图书馆怎么建?

根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当时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6.74%。1957年时,公共图书馆的建设重心是地级以上城市,独立建制的县级图书馆为数甚少,大多数县级城市只是在县文化馆里附设一个图书室^[1]。到乡村这一级,政府更是没有财力去建设和维持图书馆。但是,面对占人口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保障他们的阅读需求是无法回避的责任,更何况建国伊始政府职能部门对公共图书馆的定位就是思想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阵地,从政府的角度,也没有理由放弃图书馆这一阵地在广大农村的设置。

大约195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们在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公社创办了“人民公社图书馆”和“食堂阅览室”,黄宗忠为此撰文论述人民公社图书馆。这是首次从理论上对人民公社图书馆进行界定,即:第一,人民公社图书馆是由人民公社自办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第二,是对公社社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第三,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基层组织。把人民公社图书馆定义为“群众性文化组织”,意味着政府责任的缺席,这注定了人民公社图书馆不可能得到来自财政经费的支持。黄宗忠文提出的经费解决途径,一是公社公益金支付,二是群众捐集。以当时人民公社的财力,要建设和维护一个图书馆/室,即使不说绝无可能,至少也不具备普遍性;群众捐集则属于运动式而非常态化的方式,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对于基层图书

馆的建设和运行,以今天的理论高度去评价当年的认知水平并不公允,黄宗忠给出的解决方案显然是囿于当时的国情,在当时的国力之下如果呼吁政府履行建设图书馆的责任或许都属于不合时宜的行为。事实上,当图书馆仅仅被看作是宣传阵地时,这意味着图书馆并不是一种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制度,在这种认知背景下,图书馆的重要性就远没有达到必须首先保障的状态。1960年,正值农业大跃进时期,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文化必须大力支援农业》中,提及图书馆时倒是直奔核心问题——图书。作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的最高职能部门,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由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送书下乡,并对人民公社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8]。而专业刊物刊登的解读文章,对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建设机制与运转机制这个核心问题,也仅仅一句话:“依靠群众自己去发展”^[9]。

1961—1964年,中国的乡村图书馆建设与运行基本上处于一种运动模式之中。即以“运动”的方式建设,以“运动”的方式服务,社会各界以“运动”的方式关注与帮助乡村图书馆。“运动模式”的效果就是“轰轰烈烈地搞了一阵就不搞了,或搞得很少了”^[10-12]。

“文革”结束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几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侧面都能在这个转折点上找到对应的变化。在文化领域,1981年12月24日至1982年1月3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议上有几个信息能反映80年代初中国农村图书馆服务的状况:①主要依托于县级图书馆的服务延伸。根据文化部领导在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全国有县级图书馆1339个。而经我们查证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1980年全国的县、县级市、自治县、县级区划的总数是4958个,这意味着当时县级图书馆拥有率是27%,也就是说,即便依托县级图书馆向农村延伸服务,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服务的;②在条件比

较好的上海郊区,公社图书室每月能从社办企业中获得五六十元作为购书经费。尽管这是作为那次会议的先进典型加以宣传的,但这个典型对于全国广大农村几乎不可能产生示范效应;③“以书养书”,通过租书的方式获得收益以维持公社图书馆/室的运行,这是在这次会议上交流的另一类“先进经验”。“租书”,它似乎更清晰地诠释了“群众自发解决”这一乡村图书馆/室的建设机制。事实上,“乡村图书馆服务=租书服务”的确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

3 1979年:“以文养文”始于乡镇图书馆

尽管《图书馆学通讯》上最早公开讨论“以文补文/以文养文/以书养书”是80年代末期,但在公共图书馆领域实行“有偿服务”却始于1979年,几乎是从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就有了。最早开始“有偿服务”的是基层公共图书馆,我们不妨把当时的基层图书馆定义为县级图书馆及乡镇图书馆。基层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的原因只有一个:财政拨款严重不足甚至几乎没有拨款。图书馆为了维持运转,只能靠收费来弥补经费的短缺。较长一段时间,理论界对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并不太关注,“有偿服务”往往作为“先进经验”在一些行业性会议上交流。1986年,程亚男公开对图书馆的“有偿服务”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应该对文献借阅这一类基础性服务收费,如果说图书馆服务中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只应该是“那些把分散的知识转换为定向情报、把科学知识转换为直接生产力的各种服务”^[13]。然而,当1988年由文化部组织召开“全国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后,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的范围失控般地扩展,在全国大多数图书馆里,不收费的服务已经难觅踪迹。而文化部召开这次会议的依据是中共中央[1983]34号文件《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文件明确指出:“有些群众文化活动,可以适当收费,以

补助活动经费的不足”。此后,随着“有偿服务”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理论界不可能漠然置之。当“改革”一词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向意义时,“变无偿服务为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服务”便从理论上被认定为图书馆改革的一种成效^[14]。如果说,将图书馆服务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而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种类型,这属于保守的理论辩护的话,那么激进的理论辩护则是诸如《变图书馆为租书馆》《图书馆要搞经营创收》等^[15-16]。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一味否定甚至嘲笑这类激进的观点并不公允。“1989年,有的县图书馆全年只订阅一份《广播电视报》。在这种状况下,图书馆免费开放,对读者、对社会又有多大益处?”^[15]面对这样的诘问,我们不得不承认,图书馆选择什么方式运行并不单纯由图书馆服务理念来决定,而理论上对有偿与无偿服务的意义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并非仅仅是真理性的判断。梳理那个阶段的文献,我们发现,大城市图书馆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图书馆,由于经费保障相对好一些,其所提供的服务中公益性的比重就更大一些。当研究者以这类图书馆为样本时,往往更倾向于强调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谭祥金在1994年的社会环境里敢于质疑图书馆的“市场化”,认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还要靠国家投资保证”^[17]。这与他观察的样本,一是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普遍的公益性,二是珠三角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的办馆条件普遍好于国内大多数地区不无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后,图书馆学理论界借着纪念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百年历史,开始对一百年的历程进行梳理与反思,吃惊地发现中国图书馆职业与世界上通行的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严重偏离,也意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市场化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危害。于是,理论界站出来指正这种偏离并引介国际社会公认的图书馆职业理念。然而,在公共图书馆的运行环境远远没有得到改善的背景下,大多数管理者和从业者的观念很难跨越现实困局而选择更好的理

念;再加上由于信息技术的冲击而导致全球性的图书馆危机感,人们更容易相信市场化将会为图书馆职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18]。激烈的思想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所幸中国图书馆界最终理性地选择了职业价值观的回归。从2005年开始,杭州、深圳等地的公共图书馆率先推出面向全社会的免费服务,这表明,现代图书馆职业理念从学者的研究开始走向管理者的图书馆服务政策制定。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通过《中国图书馆学报》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范并思认为这是现代图书馆理念在中国艰难重建的结果^[19-20]。

4 1982年:图书馆立法研究萌动

中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立法问题的觉醒从何时开始已无从考察,但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1981年4月15日,时任国际图联副主席的坎贝尔先生来华访问,在与广东省图书馆界的座谈中,介绍了国外图书馆立法方面的情况^[21]。1982年《图书馆学通讯》连续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刊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的《公共图书馆法:比较研究》一书中的两个节选——《公共图书馆法的原则》^[22]和《公共图书馆法的发展及现状》^[23]。在“文革”结束不久,极左思潮在中国还远远没有退去的年代,《图书馆学通讯》编辑部能够发表代表世界公共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的译文,足见其办刊思想是相当开放的。《“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学习列宁关于图书馆立法的思想》是《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的第一篇国内学者系统研究图书馆立法的文章,从研究“列宁论图书馆工作”这一特定的角度,把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带进了中国图书馆人的视野。作者从列宁文选中梳理出列宁对图书馆立法意义的三个认知与论述:一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图书馆对文献的收集与保存职能;二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图书馆的运行经费,由于明确规定由教育人民委员会划拨,实际上明确了政府主

导图书馆建设的责任;三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图书馆人员配置与编制、图书馆开放时间、馆际互借等业务管理问题^[24]。尽管在研究列宁的图书馆立法思想时不免有“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标签,但列宁对图书馆法的认识却与西方图书馆法制思想并无二致,这与列宁早年逃亡西方时曾经受惠于图书馆服务不无关系。

整个80年代,图书馆立法问题并没有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进入9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呼唤法制社会,这一现象也对图书馆界产生了影响,于是才有了《立法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繁荣的根本保障》这样观点鲜明的文章^[25]。耐人寻味的话题是《图书馆法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面对市场经济对图书馆的冲击,还有人能冷静地指出:市场导向的改革应逐步强化和完善社会公益事业。并由此认为,图书馆法一方面要对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公益性质及其义务做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还要对确保这些义务能够顺利履行的经费来源和数量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26]。这一观念在当年图书馆大受市场经济热潮冲击的背景下实属难得。

21世纪伊始,中国图书馆立法程序终于启动,立法实践中有各种问题急需理论界的梳理与明确。比如,图书馆法主要应该规范和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能够规范和解决什么问题?回答“应该规范和解决的问题”并不难,李国新对此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而要回答“能够规范和解决的问题”则是难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图书馆界长期关注的一些制约事业发展的“实质性”问题,难以通过一部图书馆法得以彻底解决。为了消除广大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法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引导人们从“目前制定图书馆法难以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理性地看待图书馆法的局限性,成为与正确认识制定图书馆法的正面意义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事情^[27]。

图书馆法的制定并不顺利。导致立法程序被搁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立一个面向行业整体的法还是仅仅面向行业中的某个类型图书馆的法”(即所谓立大法还是立小法)这个问题

上无法达成统一。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实践界都有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为了真正有效地为立法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图书馆学会专项资助了研究项目“图书馆法立法建议研究”。这一课题从组织到开展研究再到形成成果,一方面推进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其研究成果对图书馆法的制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后来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一波三折,但图书馆法制化的脚步并未停止。一些与图书馆职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问世,其中无一没有理论界的介入。如图书馆界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制定过程中积极地参与了立法博弈,以争取有利于图书馆开展服务的最大“利益”;2008年,《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和《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由住建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批准发布;2011年《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批准发布。这三份我国首次编制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的规范性文件,都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通力合作的成果^[28]。

5 2006年:新的高度——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文革”以后首次在《图书馆学通讯》中出现关于乡镇图书馆的文章,是一篇介绍美国乡镇图书馆的研究文章,如果当时有人对“乡镇图书馆”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相信这篇篇幅不大的文章还是相当有冲击力的,其所介绍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对于中国图书馆界而言是陌生的^[29]。而此时的中国乡镇图书馆,在一部分地区仅仅是一个“传说”,在另一部分地区经过80年代以后新一轮的农村“万册图书馆/室”运动后或者有名无实,或者艰难地存在并提供有限的图书馆服务^[30-31]。相比乡镇图书馆,县级图书馆似乎是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话题,它们即使被提及,也往往是探讨县级图书馆如何向农村输出服务,人们似乎忘记了县级图书馆自身也处于急需“输血”的状态^[32]。事实上,我国县级图书

馆大规模的独立建制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即从县文化馆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县级图书馆。但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县级图书馆并没有获得新增的图书馆经费,而是“兄弟分家”,原来的经费两家分^[33]。经费保障不足成为绝大多数县级图书馆长期面临的困境。很显然,孤立地认识和解决县级图书馆与乡镇图书馆的问题,恰恰是1949年以后一直不能找到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建设与运行机制的症结之一。

直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被提出并成为现实,一种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基层图书馆建设机制终于诞生。

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以前,不能说各层级的图书馆之间是完全孤立的,我国图书馆界一直有“四级服务网络”一说,即在省级馆-市级馆-县级馆-乡镇馆之间所形成的服务网络。但这一服务网络仅仅是省内各层级公共图书馆之间自上而下的有限的支持,如送书下乡、馆际互借、通借通还以及业务辅导等。对于县级图书馆或乡镇图书馆而言,除了送书下乡之外,其他的文献支持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对于连正常服务都难以为继的基层公共图书馆,业务辅导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大。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是何时出现的已很难准确考证了,如果字面上不那么严格限定,一些类似的表达如“图书馆服务体系”早在1995年就出现在文献里了^[34]。2004年开始出现“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这类表述,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的涵义趋于明确^[35]。2006—2007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作为一个热点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专业文献上、行业会议上甚至各地的政府文件里,此时,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已经很少有歧义。根据于良芝的定义,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以保障普遍均等服务、实现信息公平为目标,独立或通过合作方式提供的图书馆服务的总和。”^[36]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目标,

它的实现方式是多层面与多维度的。所谓多层面,是指在不同行政区划层级上的实体公共图书馆之间,通过总分馆体系建立一种紧密的业务上的联系;所谓多维度,是指一个地区内,不同行业的图书馆之间,通过实体的、虚拟的方式建立一种松散的业务上的联系。一旦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意味着它将以图书馆服务体系整体的力量向该地区的民众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均等性的图书馆服务。于良芝等人把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方式具体化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各层级的公共图书馆,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村级的图书馆;二是建立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三是建设区域性服务网络^[36]。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转折,对于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县级图书馆生存与发展问题、乡镇/街道以及村/社区等层级图书馆的建设与运行问题,既是一个解决方案,也是一个整体发展的机会。

2007年前后,全国多个地方不约而同地开始通过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方式来破解基层图书馆服务能力弱的难题,广东佛山禅城区、江苏苏州市、浙江嘉兴市等率先开始了探索,尽管各地设计的服务体系模式各不相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即通过由作为总馆的高层级图书馆来带动基层图书馆或服务点的服务能力,由这些基层图书馆或服务点把图书馆服务延伸到城市与乡村的各个角落,从而实现“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职业目标。

被业界称为“嘉兴模式”的嘉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从嘉兴市市本级开始探索服务体系,其顶层设计被概括为“政府主导、三级投入、集中管理、专业化服务”^[37]。嘉兴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建设乡镇分馆,把总馆的优质资源下沉到乡镇,以实现图书馆服务的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在整个嘉兴市,市级图书馆的力量无疑是最强大的,当市馆开始在市本级探索总分馆体系时,就传递了一个信息:总分馆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总馆做大做强。当“嘉兴模式”的总分馆在市本级全覆盖以后,嘉兴市政府开始在

整个嘉兴地区部署总分馆体系建设。按照“嘉兴模式”的顶层设计,要求各县市政府必须先把作为总馆的县级图书馆做大做强。在嘉兴,一个前所未有的县级图书馆的发展机会由此到来。以县域为单元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不仅使乡镇分馆按照顶层设计的统一标准得以建立起来,而且其服务能力也得到了有效保证。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出现,看似偶然,但实际上也包含着必然性。当一次又一次运动式的乡村图书馆建设均以失败而告终,图书馆人终于开始去审视这样两个问题:即如何才能让任何层级的图书馆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如何才能让远离城市的区域能够拥有专业化、高品质的图书馆服务。2007年前后,所有关于解决像街道/乡镇、社区/村这些层级的基层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能力问题的探索,不管各自的运作模式如何,其探索的方向都指向上述两个问题。当以总分馆体系为核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最终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部署时,三个问题迎刃而解:一是政府作为任何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的责任主体被确认;二是县级图书馆的生存困境逐渐破解;三是乡镇及村级图书馆的建设与运行不再由群众自发解决,而是作为服务体系的末端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与支撑保障。此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出现的“必然性”也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无关系。在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时,再先进的理念也很难获得支持。对此,李国新给出的解释是:世界范围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图书馆事业是一项在社会进入追求全面文明进步阶段才有可能迅速发展的事业,而不是在“奔小康”阶段就能够迅速发展的事业。这就是规律,任何社会形态概莫能外^[27]。

6 结语:继续研究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始于20世纪初,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近50年的

时间处于战乱与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60年前,《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图书馆学通讯》创刊,这件事本身代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但本文却呈现了一段并不顺利的发展历程,这其中,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图书馆行业自身的原因。对这60多年的发展历程的理论研究与图书馆事业之间的种种故事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梳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的。但当我们透过理论视野去观察图书馆事业发展轨迹时,有一点可以得到确认,即理论研究从来没有缺席过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任何一个变革的过程。无可否认,理论界对图书馆事业的观察与研究有立场之别,当理论研究只能充当事业的宣传媒

介而无视问题存在时,这种状态下的理论研究将很难形成能够推动事业发展的成果。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的办刊过程中,见证了理论界先后终结“讴歌成就”类的事业发展评述,“以文养文”的问题研究,无视政府责任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研究,等等;也见证了通过立法研究来为图书馆法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理论与案例研究来提升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认知过程。未来,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前行的道路上仍然充满问题,需要理论界随时跟进观察与研究,为破解问题提供智慧与方法。这既是理论界的社会责任,也是理论研究的依归所在。

参考文献

- [1] 韩承铎,王宏钧. 谁说“今不如昔”——我国图书馆事业概述[J]. 图书馆学通讯, 1957(4): 9-12. (Han Chengduo, Wang Hongjun. Worse than before?—overview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4): 9-12.)
- [2]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小组. 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10): 6-16. (History of Library Research Group,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ianship in past decade[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9(10): 6-16.)
- [3] 刘国钧,张树华,纪国祥. 五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and 成就[J]. 图书馆, 1964(3): 4-13. (Liu Guojun, Zhang Shuhua, Ji Guoxiang.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in the past five years[J]. Library, 1964(3): 4-13.)
- [4] 吴慰慈.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主要成就[J]. 图书馆学通讯, 1984(4): 3-10. (Wu Weici. Major achievements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4(4): 3-10.)
- [5] 鲍振西,许婉玉,李哲民.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40年[J]. 图书馆学通讯, 1989(3): 38-48, 65. (Bao Zhenxi, Xu Wanyu, Li Zhemin. The forty years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3): 38-48, 65.)
- [6] 黄纯元. 我国图书馆事业战略研究[J]. 图书馆学通讯, 1986(3): 15-22. (Huang Chunyuan. Strategic study of librarianship in China[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6(3): 15-22.)
- [7] 黄纯元. 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结构[J]. 图书馆学通讯, 1987(4): 39-54. (Huang Chunyuan. The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7(4): 39-54.)
- [8] 钱俊瑞. 文化必须大力支援农业[J]. 图书馆学通讯, 1960(5): 5-8. (Qian Junrui. Culture must support agriculture[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60(5): 5-8.)
- [9] 评论员. 把农村图书馆工作推向新高潮[J]. 图书馆, 1960(5): 9-10, 11. (Commentator. Push the rural library to a new climax[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60(5): 9-10, 11.)
- [10] 胡耀辉.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图书馆为农业服务的工作[J]. 图书馆, 1962(4): 2-4. (Hu Yaohui. Reinforce

- and improve libraries to support agriculture[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62(4):2-4.)
- [11] 汪长柄. 谈谈省图书馆为农业服务的工作[J]. 图书馆, 1963(3):1-5, 6. (Wang Changbing. On provincial libraries' support on agriculture[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63(3):1-5, 6.)
- [12] 刘德元. 省市图书馆怎样为农村服务的问题[J]. 图书馆, 1963(3):5-9. (Liu Dengyuan. How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ibraries support the rural area[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63(3):5-9.)
- [13] 程亚男. 图书馆改革的思考[J]. 图书馆学通讯, 1986(2):66-69. (Cheng Yanan. Reflections on library reforms[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6(2):66-69.)
- [14] 白国应. 中国图书馆改革10年(1978—1988)[J]. 图书馆学通讯, 1989(1):11-18. (Bai Guoying. Chinese library reform in the past decade (1978—1988)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11-18.)
- [15] 苏国明. 变图书馆为租书馆[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4):31-32. (Su Guoming. Change libraries to book renting shop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3(4):31-32.)
- [16] 刘翠兰. 图书馆要搞经营创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2):49-51. (Liu Cuilan. Libraries should generate profit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4(2):49-51.)
- [17] 谭祥金. 图书馆与市场经济[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1):26-32. (Tan Xiangjin. Libraries and market econom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4(1):26-32.)
- [18] 郑建明, 万里鹏, 陈雅. 动摇根基的变革: 准市场、竞争与图书馆[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2):10-14. (Zheng Jianming, Wan Lipeng, Chen Ya. A true revolution: quasi-market, competition and librar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5(2):10-14.)
- [19]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服务宣言[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6):1.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Library service manifesto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6):1.)
- [20] 范并思. 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艰难重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6):6-11. (Fan Bingsi. Rebuilding modern library idea in China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6):6-11.)
- [21] 陈源蒸, 张树华, 毕世栋.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239. (Chen Yuanzheng, Zhang Shuhua, Bi Shidong. The chronically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4: 239.)
- [22] 乔新秋. 公共图书馆法制定的原则[J]. 图书馆学通讯, 1982(1):81-83, 63. (Qiao Xinqiu.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library law making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2(1):81-83, 63.)
- [23] 乔新秋. 公共图书馆法的发展及现状[J]. 图书馆学通讯, 1982(2):88-90, 94. (Qiao Xinqiu. The development and status quo of public library law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2(2):88-90, 94.)
- [24] 张厚生. “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学习列宁关于图书馆立法的思想[J]. 图书馆学通讯, 1982(4):21-25. (Zhang Housheng.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librarianship—Study of Lenin's thoughts on library legislation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2(4):21-25.)
- [25] 李开胜. 立法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繁荣的根本保证[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4):69-71, 40. (Li Kaisheng. Legis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4(4):69-71, 40.)
- [26] 陈大辉. 图书馆法应符合市场经济要求[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2):83-87. (Chen Dahui. The library law should accord with requirements of market econom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4(2):83-87.)
- [27] 李国新. 关于中国图书馆立法的若干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1):15-19. (Li Guoxin. On some issues related to library legisl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1):15-19.)

- [28] 李国新. 宏观微观并举,理论实践同进[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2):77-78. (Li Guoxin. Combine macro and micro, incorpo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2):77-78.)
- [29] 林筠跃. 美国的乡镇图书馆研究[J]. 图书馆学通讯,1989(3):66-67. (Lin Junyue. Study on American rural libraries[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3):66-67.)
- [30] 许培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乡镇图书馆事业[J]. 图书馆学通讯,1989(3):76-79. (Xu Peiji. Building rural librarian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3):76-79.)
- [31] 单敬兰,赵建华,赵保华. 我国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和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2):81-85. (Shan Jinglan, Zhao Jianhua, Zhao Baohua. The beginning and prospect of rural librarianship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1(2):81-85.)
- [32] 李超平. “百县馆长论坛”的历史意义[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2):27-35. (Li Chaoping.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China county librarian forum[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2):27-35.)
- [33] 林庆云. 不是“低谷”,图书馆事业仍然在发展;有阻力,但愿“婆婆”当好图书馆的“保护神”[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1):76-79. (Lin Qingyun. No down times, librarianship is still developing; confronted with obstacles, supervisors should be patron saint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3(1):76-79.)
- [34] 霍国庆. 论社区图书馆[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4):54-59. (Huo Guoqing. On community librarie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5(4):54-59.)
- [35] 刘兹恒,李武. 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弘扬与延伸[J]. 图书馆,2004(4):1-4. (Liu Ziheng, Li Wu. On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digital age[J]. Library, 2004(4):1-4.)
- [36] 于良芝,邱冠华,许晓霞. 走进普遍均等服务时代;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31-40. (Yu Liangzhi, Qiu Guanhua, Xu Xiaoxia. Towards the age of universally equal servic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3):31-40.)
- [37] 李超平.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模式”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10-16. (Li Chaoping. A study of the Jiaxing Mode for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9(6):10-16.)

李超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58。

(收稿日期:2017-07-27)